

藏族文化

TIBETAN CULTURE
IN BEIJING

在

北京

张羽新 刘丽楣 王红 张双志 著

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
在 13 世纪中叶的元代，从远在万里之外的西藏传播到北京
清代以汉、满、蒙、藏、维五族为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统一的
象征，空前地提高了藏族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中的地位，
极大地推动了藏族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煌壮观的藏传佛教寺庙和喇嘛塔等藏式建筑
动人心弦的建筑形象，将藏族文化永久地刻写在北京的蓝天
于古都个性特点的形成和皇家园林性格的塑造
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
族文化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族文化在北京/张羽新,刘丽楣,王红著.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12

ISBN 978 - 7 - 80057 - 997 - 4

I. 藏... II. ①张... ②刘... ③王... III. 藏族 - 民族文化 - 研究
- 北京市 IV. K28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1376 号

藏族文化在北京

作 者 张羽新 刘丽楣 王 红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210 千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057 - 997 - 4/K · 174

定 价: 22.00 元

前 言

“藏族文化在北京”——如果作为谈天说地的话题，许多人（包括很多“老北京”在内）都会感到陌生，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课题，它却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这是古都北京历史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作为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可以用八个字略加概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多民族文化的兼容性。这是由于北京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北京地处太行山东麓与华北大平原结合部的战略要地，明朝人称它：“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沧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① 其北接蒙古高原，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也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北京猿人”所代表的中华古老文明的曙光，琉璃

①（清）夏燮编撰：《明通鉴》卷十六。

河周文化遗址、大葆台汉墓等所展现的商周秦汉灿烂文化，都会令人对北京历史文化的渊源、血脉浮想联翩、遐思无限。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代的山戎、奚、库莫奚、靺鞨、匈奴、鲜卑、柔然、契丹、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都和广大汉族一起，在这一带留下了文明进步的足迹（长城就是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和交流的遗迹），因而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兼容并存的区域文化特色。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辙在一首题为《燕山》的诗里写道：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
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却顾沙漠平，南来独飞雁。
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
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
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浣。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区区用戎索，久尔靡郡县。
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攻坚甚攻玉，乘瑕易冰泮。
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①

作者用诗歌的形象语言描绘了古老北京的山河形胜，说明它是夷（古代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汉分界、结合之区（即所谓“限夷汉”）。居民有半数北方少数民族（诗中“腥臊久不浣”、“左衽今已半”之句，即此意），因而“居民异风气”，即其社会风俗与中原汉族地区大不相同。当时宋、辽对峙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痛苦，作者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汉族中央政权统一全国（这当然是作者大汉族主义情绪的流露），使人民群众脱离战乱之苦。如果我们抛开作者的历史局限性，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

^① 苏辙：《栾城集》卷十六；（清）佚名辑《人海诗区》曾收录此诗，但文字略异，见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9页。

角度来看，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北京地区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交流（这是中华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和经久不衰的活力），正是北京历史上区域文化的重要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由于北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决定的，也为后来元明清时期北京历史文化个性特点的形成，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北京历史文化特点的形成，经历了元、明、清三代。13世纪中期，元朝统一全国，在今北京地方建都，命名为“大都”。明、清以来，北京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密切联系进一步加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到18世纪中叶，清朝彻底统一了新疆，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奠定了祖国近代版图，近代意义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正式成型。与此同时，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个性特点也正式形成。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多民族文化的兼容并存，不过这跟元代以前以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区域性多民族文化兼容并存，有着巨大的历史进步和本质的不同——它是指全国性（而不仅仅是北方地区）的多民族文化兼容并存，并共同创造了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个性特点，铸造了这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的灵魂。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藏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融为博大精深的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这些，正是本书所要深入探讨和试图解读的主要问题。

一、以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之所以在13世纪中叶的元代，从远在万里之外的西藏传播到北京，历史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1. 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潮流，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2. 元朝统治者崇奉喇嘛教的政治需要及其政策；3. 北京成为国都，确立了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

二、我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3 世纪中叶，国家大统一的历史潮流汹涌澎湃，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佛教界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学者）顺应历史潮流，代表西藏地方僧俗势力，与蒙元统治者结成政治联盟，为蒙元统一西藏作出了历史贡献。其事业的继承者八思巴等，也积极为元朝统一全国的大业奔走效劳，取得了元朝统治者的高度信任。藏传佛教首领人物成为元朝统治全国的重要依靠力量，为元朝奉行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奠定了政治基础，创造了社会条件。

为彻底完成统一全国大业，巩固中央政权，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四年（1267 年）在金中都城东北另筑新城，九年（1272 年）改称“大都”，二十年（1283 年）落成。从此，北京正式成为国都。一大批藏族高僧，也随元朝中央政权来到大都，从而把藏族文化带到了历史上的北京。元世祖忽必烈及其继承者大力推行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在大都建造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作为藏族大喇嘛的宗教活动场所；创设帝师制度，设置宣政院管理吐蕃（西藏）和全国佛教事务，以萨迦派高僧领其事；皇宫和喇嘛庙，年年月月都由藏族大喇嘛举办佛事活动；元朝还在大都开办了由藏族大喇嘛教授八思巴字的蒙古国子学，组织一大批藏、汉及蒙古、维吾尔族高僧，翻译和校勘藏、汉、梵文经典，促进了藏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在元朝统治全国的数十年内，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主导了元大都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现在，安定门外安贞里、小关一带元大都遗址公园内，有一组元朝皇帝与藏族大喇嘛共议国事的巨大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用出神入化的雕塑手法，将这段历史的重要场面，变成凝固于空中的图画，激起人们对元代藏族文化在北京的历史追思。

三、清代以汉、满、蒙、藏、维五族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统

一的象征，空前地提高了藏族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中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藏族文化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清代乾隆时期，全国实现了空前大统一，此后，再没有出现过大的民族分裂，形成了各民族的分布格局。各民族之间政治和经济、文化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和加强，在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中，休戚与共的大一统思想深入各民族之中。这标志着近代中华民族的形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清朝统治者（主要是乾隆皇帝）提出了以汉、满、蒙、维、藏五族一体作为国家和民族大统一象征的思想。

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政治观念，源于清朝统治者对当时国情的分析认识。清朝统治者（主要是乾隆皇帝）认为，满族统治全国；汉族人口众多、文化经济发达，是国家、民族的主体；蒙古族（主要是蒙古王公贵族）是中央政权的重要支柱和主要依靠力量，也是防御外来侵略的北方藩篱；维吾尔族是国家西部边疆——新疆的主体民族，直接关系到西部边疆的稳定与安危；西藏是国家西南门户，又是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和中心，直接关系到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等民族的人心向背。基于这种认识，乾隆认为，只要汉、满、蒙、维、藏五族一体，就会国家统一、皇权巩固。

为了宣扬、贯彻这种政治思想，乾隆于十九年（1754年）为避暑山庄的正门——丽正门，亲笔题写了汉、满、蒙、维、藏五体文字门额（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创举）。坐落于热河（今河北承德市）的避暑山庄是当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皇帝每年有半年时间住在这里，全国各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和外国使节，要进出丽正门觐见皇帝。其题写五体文字门额的政治用意不言而喻。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乾隆还下令将皇宫（今故宫博物院）东、西、南、北四面大门，以及国子监、帝王庙等重大政治活动场所的门前下马碑，均用五体文字题写。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

又颁发谕旨，将盛京（今沈阳市）皇宫的正门——大清门，以及永陵、福陵、昭陵“所有下马木牌，俱著改用石碑，镌刻清（满）、汉、蒙古、西番（藏）、回子（维吾尔）五体字，以昭我国家一统同文之盛”^①。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清朝还官修了《五体清文鉴》和《西域同文志》两部汉、满、蒙、维、藏五体文字对照大型辞书。还组织一批藏、汉族高僧和佛学学者，对勘藏、汉文大藏经，根据藏文《甘珠尔》、《丹珠尔》译成《满文大藏经》，并在前代基础上完成《蒙文大藏经》的编译。

所有这些，不仅使藏族文化在北京空前广泛地传播，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藏族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中的地位。

四、辉煌壮观的藏传佛教寺庙和佛塔等藏式建筑，以动人心弦的建筑形象，将藏族文化永久地刻写在北京的蓝天下，对于古都个性特点的形成和皇家园林性格的塑造，都有着重要作用。

北京地区最早出现的藏式建筑，是元代尼泊尔仕元（“仕元”是说在元朝做官的意思）的建筑和工艺专家阿尼哥主持建造的白塔（今名“妙应寺塔”）。它那洁白、高大的身影，将人们的视觉和丰富的想象引入浩渺的蓝天。明代永乐年间建金刚宝座式五塔。清代在御园北海最高处再建白塔一座，引领全园风景。乾隆时建造的清净化城塔，造型更是别具一格。后来，大大小小的覆钵式佛塔，遍布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最著名的有银山塔林）。这些前所未有的建筑形式，直接影响着古都北京的风貌。

对北京风貌影响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多建于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此前，元、明两代的藏传佛教寺庙，大多仍沿袭汉式寺庙规制，对北京的整体风貌影响不是很大。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时期，在北京和热河等地大量仿建西藏著名藏传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卷三。

佛教寺庙，例如，仿西藏托林寺的雨花阁，仿西藏桑耶寺的承德普宁寺、颐和园的须弥灵境、雍和宫的大佛殿，仿布达拉宫的普陀宗乘之庙（承德外八庙之一），仿扎什伦布寺的须弥福寿之庙（在承德）等。这些寺庙创造了一种汉藏结合的建筑形制，一般是寺庙的前半部为汉式寺庙格局，后半部为仿藏式寺庙格局，在建筑的细部手法上，都体现了藏汉结合的风格。

在清代皇家园林，例如北京的三山五园、承德避暑山庄等，都建有藏式寺庙。这些寺庙几乎都坐落在全园地势最高处，而且体量宏大、色彩华丽，因而自然成为全园建筑的重心和风景的点睛之作，对于园林面貌和特性有着重大影响。

从北京古城的建筑布局来看，藏传佛教寺庙都建在皇宫周围，位置重要，而且其体量崇宏高大，色彩争奇斗艳，远远超过衙署和民居，仅次于皇宫。这就极大地突出了藏传佛教寺庙在京城中的地位。其对古都整体形象的影响，以及对城市性格的形成，无疑起了重大作用。先人对此早就有深刻的认识，读古贤诗篇可以深刻体会：

文皇定鼎都燕蓟，三辅黄图誇壮丽。
九重官阙何嵯峨，百二山河咸拱卫。
五凤高楼逼太清，六龙御宇泰阶平。
朧朧晓日升金阙，缥缈红云拥玉京。^①

——这是写文皇（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之后，皇宫的辉煌壮丽（这是古都的中心），也是给人的第一印象。

① 徐夔：《帝京篇》，见《人海诗区》卷一。

西山万佛寺，烂若舒锦绣。^①

西山二百寺，蝉缓琉璃刹。……吐磴穷百盘，束流规千折。

蹙阶白玉璫，飞坐黄金屑。斗削神力迥，向背鬼工绝。^②

——这是诗人以生花妙笔，描绘了佛寺（其中主要是藏传佛教寺庙，这从“琉璃刹”一句可知）的奇丽壮美。

两者交相辉映，并肩比美，共同渲染了古都的壮丽。两者缺一，这座闻名于世的历史文化名城将会大大逊色。

五、在历史上，特别是明、清以来，藏族文化对北京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有些则与汉、满等民族文化交流融合，渗透到日常社会生活中，变成了北京的传统文化。明、清时和北京有关的长篇小说，如《英烈传》、《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在北京的诗歌史上，元代以来和藏传佛教有关的诗词，目前能见到的，至少有一两千首。这当然也是值得重视的文化遗产。

藏族文化，有很多也渗透到了北京的社会生活中。元、明、清时期生活在北京的汉、满、蒙等民族中的一些人，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改信藏传佛教。元、明、清的皇宫中，经常有大喇嘛作法事，烧香拜佛成为宫廷风俗。清代帝后丧事，都要请喇嘛念经，有的还将陵墓地宫刻满藏传佛教的图像、经文。“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些也直接影响到民间，不少普通群众烧香拜佛，办丧事请喇嘛念经。另外一些和群众日常生活有关的藏族无形文化，则融于社会生活中，变成了民间习俗，例如，喇嘛庙庙会，看雍和宫打鬼等。不过，习俗是随着历

① 李梦阳：《平坡寺》，见《人海诗区》卷四。

② 王世贞：《西山诸寺》，见《人海诗区》卷四。

史发展而流变的。这些习俗，不论是宫廷的或是民间的，许多已经消失，有些则延续下来，这是历史对文化的沉淀。（本书主要是对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及其一般社会影响进行考察研究，至于藏传佛教对北京历史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篇幅所限，暂时从略，将来拟做专题研究介绍。）

六、经过历史长河过滤和沉淀下来的藏族文化遗迹、遗物，是北京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我们说北京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它集中了全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这是因为北京具有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历史地位，具备其他任何地方不可能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历史的沉淀，许多有形的藏族文化，已经变为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除前面已提到的藏传佛塔、藏传佛教寺庙之外，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等文物博物馆单位，还收藏有大量与藏族有关的文物和历史档案，例如碑匾题刻、诏书和奏稿等各类档案、印章、造像、法器、唐卡、藏经、生活用具等，品类过百，数量以数十万或百万计。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宝库中的这些瑰宝，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

我们追寻北京历史上的藏族文化，不是为了猎奇，更不是怀旧，而是为了北京的今天和明天，弘扬历史文化的活力。现在，故宫、北海、颐和园、雍和宫、八达岭等，凡是北京著名的旅游风景点，几乎都有藏族文化。它们吸引了众多的旅游参观者，直接服务于北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生活，这就是历史文化活力的生动体现。我们的任务是要大力挖掘、弘扬这种历史文化的活力。至于目的是否达到，等待读者的品评。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 / 1

帝师和一大批藏族僧人为大都带来了藏族文化 / 16

建立藏传佛教寺庙,把藏族文化写在了大都的蓝天 / 31

皇家“做好事”,藏族文化笼罩在香烟缭绕中 / 54

藏族文化在元大都结硕果,中国文化史上添奇葩——蒙古国子学和藏汉文大藏经对勘 / 65

明清两代崇奉藏传佛教,一大批藏族喇嘛长驻北京 / 90

明清两代遍布京城的藏传佛教寺庙 / 127

大、小金川一批藏族成为北京的永久居民 / 157

藏族文化为皇家园林添彩 / 167

故宫秘藏的藏族文化 / 180

藏族文化融入老北京的社会风俗中 / 213

附录 民国初期藏族文化在北京的传播 / 235

后记 / 246

主要参考书目 / 248

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藏传佛教 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 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

13 世纪的中期，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元世祖忽必烈制订、推行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大批藏族高僧由西藏高原来到京城，于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但是，要具体说明这个问题，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做长期的、艰苦的考察、研究。为此，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透过沉沉漫漫、迷雾笼罩的时间隧道，揭示那历史的一页又一页，并将它展示给读者。

一、元大都的建立

公元 1206 年，在中国漠北草原的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发生的一件大事，永远“定格”在历史老人的记忆中——因为它大大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件非

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了，但是借助于历史科学的抽象力，我们仍然可以想象那壮观的一幕：在“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广阔草原上，万骑云集、人头攒动，迎风猎猎的九旂白旗，在蓝天白云下格外引人注目。在这蒙古各部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上，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国大汗，号“成吉思汗”。刀矛马鞭齐举，遮天蔽日；欢呼呐喊，震山动地。这似乎是宣告天地，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大元”王朝即将来临。

成吉思汗胸怀大志，谋勇兼备，史家有“深沉大略，用兵如神”之誉。他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经过 20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统一了蒙古各部，又攻金灭夏，西征中亚，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因而被尊为太祖。

1227 年农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幼子拖雷监国。1229 年，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1232 年，拖雷在作战途中死去。1241 年，窝阔台死，乃马真皇后称制。1246 年，贵由即蒙古大汗位。1248 年，贵由死，斡儿立海迷失皇后称制。1251 年，蒙哥即大汗位。1259 年，蒙哥死于南征途中的四川。1260 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后改称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建元中统。忽必烈以新朝雄主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傲视神州大地，金戈铁马，直指龟缩江南的南宋小朝廷。1264 年，改元至元。至元八年（1271 年）十一月，建国号“大元”。至元十六年（1279 年），元军扫荡了集结在广东新会海中之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南宋灭亡。元朝彻底统一了全国。

元代思想家刘因写有《白雁行》一诗，记述了这次改朝换代的历史事件：

北风初起易水寒，北风再起江水干，
北风三吹白雁来，寒气直薄朱崖山。
乾坤噫气三百年，一风扫地无留残。

万里江湖想潇洒，伫看春水雁来还。

诗中以“北风”借指蒙古，“白雁”则是灭宋元军统帅伯颜的谐音。这次王朝变革不仅激起了人们思想大变化，也引发了神州大地的重大变革。

历史上的北京，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发展，地位不断提升，并随着元朝统一全国事业的基本完成，由金朝地方政权的政治中心（金中都），上升为全国都城，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简要地追述一下在这巨大变革时代北京发展的历史足迹。

1215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攻占金朝中都（今北京），复旧称为燕京。同时，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成吉思汗则率部退回漠北。1217年，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他受命之后，当即在燕京、西京（今山西大同）设置行省，作为统治汉族地区和继续攻打金朝（时金朝的都城已迁至汴京，即今河南开封）的重要政治、军事基地。窝阔台继位大汗之后，继续在燕京设置行省，并开始在这里派驻断事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当时称之为“燕京行台”或“行尚书省”。他又委派汉化的契丹贵族、大政治家耶律楚材，以燕京为根据地，扩编中原户口，制订中原赋役制度，大大充实了蒙古汗国的实力。又在燕京设立编修所，编辑出版汉文经史。这些，为后来的元朝统一全国打下了政治、经济基础，为元朝对广大汉族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显示了燕京在当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之后，为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逐步把统治中心由内蒙草原南端的开平转移到了燕京。他即位后，为加强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分置十路宣抚使，并在燕京设行中书省，实际上是把燕京作为了第二个政治中心。后来，又将设在开平的

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

中书省移至燕京，与燕京中书省调整合并。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1264年），改燕京为中都，正式确定了燕京为第二都城的地位。至元四年（1267年），正式动工，在金中都旧城的东北修建新城。择址和规划主要是由汉族人刘秉忠承担完成的。第二年十月，皇城建成。至元八年（1271年），始建宫殿。翌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定为全国首都。十年（1273年），建正殿及配殿。十一年（1274年）宫阙竣工，同年四月，又建东宫，十一月建延春阁。十三年（1276年），全部工程完工。元大都的规划布局是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都“左祖右社，面朝背市”的原则设计的。宫殿建筑采取严格中轴对称的格局。中轴线宫殿建筑由南而北，大明殿（为举行大典、处理朝政的正殿）、延春阁（皇帝在这里接见大臣和修佛事），以及其他宫室。宫城之西，隔太液池，南有隆福宫（太后居所），北有兴圣宫（太子所居）。

元大都的正式建成，确立了它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因此，它才成为全国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在西藏高原成长发展起来的藏族文化之所以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为深入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统治时期的民族宗教政策谈起。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传统的不同，各个民族的语言、心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又有着不同的特点。所以，元朝在统一全国、巩固政权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和妥善解决民族宗教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成败的关键。其中，宗教问题尤其重要，因为少数民族中几乎全部信仰宗教，宗教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心的向背和政治局势的发展，这在政权对社会控制能力低下的战争混乱情况下尤其如此。

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对这一点是有切身体会的，故对各种宗教

都采取了兼容并蓄、广事利用的开明政策，以广泛争取各种宗教势力的支持，减少统一战争的阻力。

蒙古人原来信仰原始的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特别是至高无上、永恒不灭、主宰一切的“天”。但是，它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教义和仪轨，因而还不像封建社会及其后来形成的各种宗教那样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排他性，所以，容易接受更“高级”的宗教。这是蒙元统治集团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政策的主观基础和历史环境。

倡导这项基本政策的是蒙元政权的开创者成吉思汗。在统一全国和对外征服的过程中，他对于接触到的许多宗教，例如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都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不舍此取彼，也不尊此抑彼。他特别尊重、优礼各宗教中精通经典、有学问和道德高尚的人，给予极高的礼遇。同时要求他们利用各自的宗教权威，为蒙古统治集团的统一战争和对外征服服务。例如，他对汉族基本上采取的是征服政策，但和当时道教新派——全真派的宗师丘处机却搞政治结盟，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佳话。他以极高礼遇约请“徒满天下”的丘处机晤谈。丘处机从山东莱州出发，风餐露宿、涉水翻山，历时一年又两个月，穿越天山，渡过阿姆河（在中亚地区），到达了成吉思汗西征行营。他向成吉思汗讲道三次，主要内容是：长生之道，清心寡欲；一统天下，不嗜杀人；为治之方，敬天爱民。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1224年2月，丘处机定居燕京（今北京）后，成吉思汗还多次传旨给他：“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当时，燕京已是蒙古统治中原汉族地区的战略根据地，成吉思汗的政治用意不言而喻。

成吉思汗事业的继承者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在继承成吉思汗政治遗产的同时，也都基本遵循了成吉思汗倡导的“兼收并蓄、广事利用”的宗教政策。

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的政治结缘，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布